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SHEHUI XINGBIE SHIJIAO XIA DE
GUIZHOU SHAOSHUMINZU FUNÜ YANJIU

尤小菊 张 晓◎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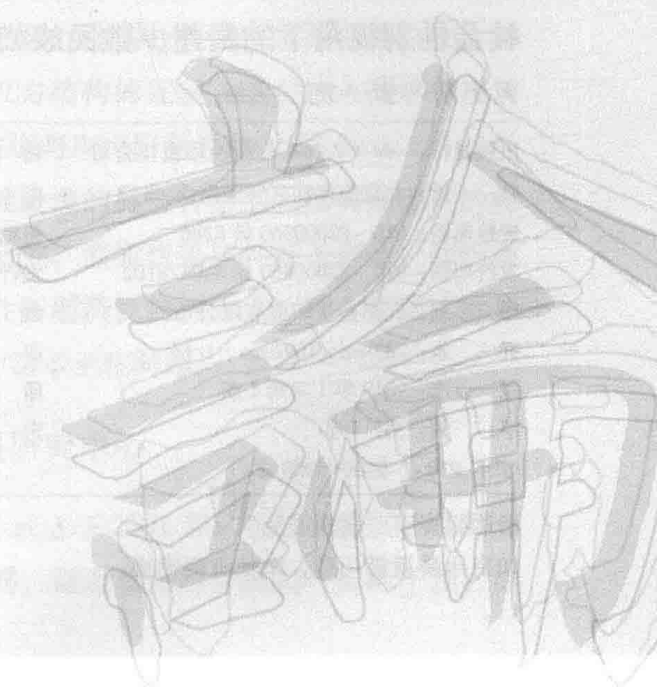


今日人类学民族学论丛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Today Series

贵州大学民族学重点学科群建设项目资助
贵州大学重大文科项目“社会性别、族群与发展”（GDZT201502）阶段性成果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 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尤小菊 张 晓◎主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尤小菊, 张晓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 - 7 - 5130 - 5969 - 5

I. ①社… II. ①尤… ②张… III. ①少数民族—妇女—研究—贵州 IV. ①D442. 8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73754 号

内容提要

这本论文集是贵州大学妇女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近十年来从历届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精心挑选出来的, 也是贵州大学民族学学科近十年来教学与科研实践在女性人类学领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在妇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 全球化经济裹挟下的中国少数民族妇女在传统与现代话语夹击下的境遇更加复杂。从女性主义的立场, 抛弃宏大的妇女一体的概念, 关注全球化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女性的多样化实践, 强调女性知识谱系和女性个体经验的重要性, 将女性问题放在社会实践、社会转型中去重新审视和考量, 扩展传统人类学的研究视野, 呈现现实生活中少数民族女性的多样性面貌, 是这本论文集的努力旨趣所在。

我们希望这本集子能引起更多学界同仁和社会力量关注少数民族妇女发展等社会议题。

责任编辑: 冯 彤

责任校对: 王 岩

封面设计: 张 冀

责任印制: 孙婷婷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

尤小菊 张 晓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 <http://www.ipph.cn>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气象路 50 号院

邮 编: 100081

责编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386

责编邮箱: fengtong@cnipr.com

发行电话: 010 - 82000860 转 8101/8102

发行传真: 010 - 82000893/82005070/82000270

印 刷: 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大网上书店、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25

版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1 千字

定 价: 89.00 元

ISBN 978-7-5130-5969-5

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言

一、女性人类学的发展

兴起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女性人类学已成为国际学术领域的热门议题之一。1975 年，密歇根大学出版的《迈向妇女人类学》标志着女性人类学的成熟。

中国女性人类学研究则处于初始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特别是 1995 年世界妇女大会后，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才逐渐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已有研究领域多集中于妇女理论、妇女现实问题、妇女（口述）史研究。学术界已有研究范式主要关注的是以妇女问题为切入点，以妇女为研究对象，就女性论女性或对女性经验的静态研究。大多学者把少数民族妇女视为弱势群体，对其研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人文关怀，而缺乏科学意识和理论思考。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领域普遍缺乏性别比较、性别分析的观念与视角，较少触及社会性别实践动态及其相关的多重权力结构的互动。从女性人类学角度对少数民族地区妇女研究，特别是进行实证与应用研究为数不多。

中国正处于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交接碰撞的社会转型期。如何在宏大的社会转型的背景下，开展少数民族妇女研究，需要借鉴国外相关理论，找到西方女性人类学理论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问题研究的切入点，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研究，并思考和探讨女性人类学的中国本土化问题。

二、贵州大学民族与妇女发展研究中心

贵州大学民族与妇女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于 2001 年。中心成立宗旨是针对贵州少数民族妇女所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通过项目的方式进行实际干预，寻

求解决的办法，为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的发展做出贡献；探索具有实效性的学科发展模式，将“教学”“研究”和“发展”结合起来，让“研究”能够为教学和现实服务，使学生能够学习到针对贵州实际情况、解决具体问题的知识及理论；而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也能够参加到具体的项目里面，能够学中用，又在用中学；妇女发展所积累的实践经验又给研究提供研究基础。

中心主任张晓教授原为贵州省社科院民族所所长，2007年调入贵州大学，致力于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社会性别与妇女发展等教学与科研工作。专著《西江苗族妇女口述史研究》是中国学者在少数民族妇女口述史方面的开创之作。张教授先后为民族学研究生先后开设《社会性别与族群发展》《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女性人类学》《民族文化遗产与妇女发展》《应用人类学》等社会性别相关课程。青年教师尤小菊博士于2008年加入该中心，自2012年至2016年为本校民族试验班本科生和民族学专业研究生先后开设《社会性别概论》《女性人类学》课程。

另外，中心也一直不间断地推动妇女学和社会性别学科梯队建设，并建立与国际妇女学、社会性别学学界的联系。贵州大学民族与妇女发展研究中心与美国密歇根大学有长期良好的学术联系。2001年6月，密歇根大学妇女研究中心多名学者获邀参加在贵州贵阳召开的“社会性别、民族与社会发展”研讨会，双方正式建立学术联系。2007年密歇根大学王政教授赴贵州大学进行学术交流，并举行两场专题讲座。2009年6月26~29日举办的“社会性别研究国际学术会议”，双方进一步加深了学术联系。2012~2013年，贵州大学副教授尤小菊赴密歇根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研究所研修一年，主修女性人类学与社会性别。2014年7月，复旦—密歇根大学社会性别研究所举办第三届“社会性别：学位论文写作的有效范畴”高级研修班。中心派出一名青年教师和一名研究生全程参与。

正是在该中心老中青教师十几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以细水长流的方式不间断地推动贵州大学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的学科建设和贵州少数民族妇女研究，从而渐渐促成少数民族妇女研究并使之成为贵州大学乃至贵州省的特色研究领域。

三、关于这本集子

我们目前处在一个急剧变革与快速转型的发展时代。全球化发展为不同国家的不同族群妇女的本土化实践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和更多的机会。如何在具体研究中抛弃宏大的妇女一体的概念,探索全球化时代不同少数民族妇女的多样化探索,强调探索女性个体主观经验的重要性,将少数民族妇女研究放在社会实践、社会转型中去审视和考量,是这本论文集的努力旨趣之所在。

本论文集收录的四篇论文均为贵州大学民族学研究生的硕士学位论文,也是贵州大学民族与妇女发展中心在长期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中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蒙祥忠作为贵州土生土长的水族学生,完成一篇“家乡人类学”研究。论文以水族从酒曲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制作过程为研究对象,探讨水族的生命观。水族将 120 种酒曲植物作为神圣物看待,根据植物的特性、功效、性别等进行独特的命名与分类,并根据本民族的文化机制制订相关的采集原则,以及根据不同的植物起到不同的功效和同一种植物不同的部位具有不同的效用而制订相关的利用规则。在水族看来,植物既然具有生命力,那么它们就有雄性和雌性之分,进而可进行“婚嫁”,通过交配而诞生新的生命。在这样的植物认知的基础上,水族先民创造了独具特色的酿酒工艺,水族酿酒工艺的过程是无意识模拟人造生命的过程。水族把 120 种植物看似生命的种子,妇女是生命的缔造者,酒是新的生命。水族通过无意识的人造生命的模拟,表达了对生命起源的崇拜、对生命繁衍的渴望、对生命护佑的意愿,以及对生命壮大的祈求。水族女人不仅是酒曲植物采集者,也是植物认知体系的拥有者,同时也是酿酒工艺的实施者,她们不仅是新生命的缔造者,而且也是酒文化的创造者。

张妙琴以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切冲苗寨为例,将麻的切入点和女性的视角相结合,探讨麻的物性和文化意义,物与人的互动—互构、对社会关系的塑造或凸显。笔者首先分析麻因“极强的环境适应性”“较好的柔韧性”“可食性”“可入药性”等特殊物性而进入切冲苗族的社会生活,获得象征、记忆、交换、转换、连接等文化意义,进而塑造或凸显当地的社会文化。在这一分析下,笔者探讨麻与其最初进入纺织领域的掌握者苗族妇女之间的互

动—互构关系，并进一步挖掘探讨该关系背后，由麻在多种社会交换场合中建构的社会关系及关系主体间的互动，即麻和麻织物建构的，在个体间的情感交换和家族间婚姻交换中的男女夫妻关系；在贡献与回报交换中的女人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权责关系；在纺织中女人间互慰共勉的姐妹情。这些关系在麻与妇女结合的这条线上构筑切冲苗族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苗族妇女织的麻布是社会关系的隐喻。苗族妇女不只在织布，更在编织社会关系网络。用于家族间进行婚姻交换的女人，如麻纺织中一根根纬线，串起一条条经线般的延绵不断的父系继嗣群，编织一个基于麻与妇女之脉络的社会关系网络。最终，不仅展现麻在切冲苗族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凸显出苗族妇女在当地民族文化的创造与传承中的能动性和贡献性，更证实由麻切入理解大花苗社会文化和社会关系的可能性和重要性。

潘璐璐是来自黔东南的苗族学生。她以四个不同地区为田野点，将苗族妇女小群体的文化现象放置于全球化和城乡流动的语境中，从苗族妇女结群现象本身，窥视苗族社会结构和苗族两性关系差异，分析苗族妇女在各种场景下结群的产生原因、特性及其功能；并在社会流动的特殊语境与背景下，归纳出四种不同地域、有各自特性的妇女小群体，运用女性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分别从主体性意识、身份认同、社会网络、社会空间、文化调适、文化传承等多维度分析四个不同苗族妇女的结群实践。结群不仅是她们对自我身份认同归属的表达，女性的主体能动性也得以在亲属关系、两性角色、情感、社区组织的参与以及日常生活实践等不同层面得以鲜明地体现。妇女小群体借由自己的群体力量，展现自我主体性和姐妹情谊、抵抗父权和汉族民族中心主义权威，也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途径。而对这些活动描述的背后，反映妇女小群体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小群体的变迁实际上就是苗族传统文化的变迁，是认识当下苗族社会的一个必要途径，从而为文化多样性和传统文化的变迁和传承提供一个研究视角。

贾婷采用女性主义口述访谈法进入舟溪田野，结合人类学传统的参与性观察进行调查。在舟溪苗族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通过叙述舟溪传统社会、传统技能（纺织及纺织文化）改革的前后变化，性别分工的变化导致性别角色和两性关系的变化，以此揭示社会文化建构社会性别的过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苗族妇女的角色在不断变化，分别从文化调适、传承等方面体现自

己的主体性。事实上，纺织代表一种性别分工，是象征妇女社会角色的标志。当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后，纺织开始分化，那么妇女的社会角色将会改变。通过从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工业发展、科技引入和旅游业发展等方面叙述舟溪社会的改变，阐述舟溪苗族社会从内到外建构当地性别文化的过程。

四、缺憾和若干亮点

研究选题上，研究对象只涉及水族和苗族，尚未扩展到贵州省内其他少数民族妇女。贵州省有 17 个世居少数民族，对其他少数民族妇女继续展开深入研究是我们未来的努力方向。

研究方法上，仍是以人类学传统的民族志方法为主，综合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口述史，同时也会依据各自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有所扩展，如潘璐璐，突破人类学传统社区研究，采用多点民族志实践，这种努力值得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四位作者本科专业均不是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蒙祥忠和潘璐璐作为贵州本地的水族和苗族，某种程度上其研究可归为“家乡人类学”范畴，其他二位作者则来自贵州省外。作为跨专业的汉族学生，他们能在三年的时间内系统完成民族学人类学专业训练，并把硕士论文写成这样，已属不易。当然错误在所难免，责任全在指导老师。我们编这样一本集子，既是对贵州大学民族学硕士点成立十多年在社会性别与少数民族妇女教学与科研领域的反思和总结，另外也希望引起学界和社会各届力量关注少数民族妇女发展以及社会性别主流化等社会议题，吸引更多有识之士投身此领域。

编者

2018 年 9 月 1 日

目 录

论水族对生命的理解与表达

——从酒曲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的解读 蒙祥忠 (1)

“麻”与苗族妇女的人类学研究

——以贵州省威宁县雪山镇切冲寨为例 张妙琴 (64)

城乡流动中苗族妇女小群体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变迁 潘璐璐 (133)

性别视角下的舟溪苗族妇女纺织 贾 婷 (220)

论水族对生命的理解与表达

——从酒曲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的解读

蒙祥忠

导 言

一、选题缘由

植物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 Morgan）认为，人类进入蒙昧阶段在局限的生活环境内以植物的根和果实作为天然食物。当人类脱离蒙昧阶段而进入低级野蛮社会后，通过种植获取了淀粉食物，人类通过田野农业而获得无穷食物。^① 世界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总结和发展各自利用植物的丰富经验。有些民族通过文字、图形、实物、语言和风俗习惯等方式对植物进行记载，但有些植物尚未被整理与发掘。

生活在世界自然遗产茂兰喀斯特山区的土著民族将丰富的植物种类保存至今，茂兰喀斯特申请世界自然遗产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当地民族世代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笔者于2007年在茂兰喀斯特山区进行民族调查发

① [美]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 [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19-24。

现,^①当地的水族同胞至今仍传承着使用 120 种植物作为制作酒曲的原料,并对这些植物有特殊的认知方式。在植物认知的基础上,利用植物创造独具特色的水族酒文化。透视水族酒文化,其文化的内核象征了水族的生命观,植物与生命观有密切的联系。

茂兰喀斯特山区的水族利用 120 种植物制作酒曲,这些植物在当地水族人看来都是神圣的植物。当地水族制定一系列的采集与利用植物的文化机制,将植物进行人格化的命名与分类,从植物的采集到酿造的整个过程均由妇女操作。当地水族认为 120 种酒曲植物具有雄性和雌性之分,植物有大、中、小之分,这些植物分为药引、酸、甜、苦、辣五大类别,不同酒曲植物具有不同的功效,且在制作酒曲与酿造中严格规定了各种禁忌等。透过其文化现象,它象征的意义是,120 种植物象征生命的种子,酒曲制作象征两性结合的模拟过程,妇女象征孕育生命的子宫,酒象征新的生命。整个酒曲制作和酿造的过程是模拟人造生命的仪式过程。

从水族文化研究的成果来看,前人尚未涉及以水族酒曲植物的认知和酿酒工艺为研究对象来探讨水族的生命观,也很少有人前往此地进行民族学调查研究,笔者选择这样的命题将是开创性的研究,意义重大。

二、研究的意义

本论文以水族从酒曲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为研究对象,探讨水族的生命观。研究的意义:一是有利于保护民族地区资源开发与利用。二是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提供政策参考。三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四是为论证万物有灵论、文化的整体观、认知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之间具有密切的联系,提供一个鲜明的案例,丰富了人类学的研究成果。

三、文献回顾

(一) 生命问题的复杂性

自古以来,生命问题一直是个复杂性问题,形成了诸如,古代思想家的

^① 笔者于 2007 年主持国际福特基金课题“西南各少数民族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发掘、传承、利用、推广研究”之子课题,课题总负责人为杨庭硕教授。结题后,笔者继续跟踪调查,历时两年时间完成了本论文。

生命观、生理学的生命观、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生命观、生态学的生命观和进化论的生命观等。

中国古代的生命观主要有儒家生命观和道家生命观。儒家生命观表现为自然属性倾向。如孔子所整理的《易传》中的《系辞下》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以及在《序卦传》的“有天，然后万物生焉”表示生命的自然属性。道家生命观认为“天人合一”，在《尚书》《礼记》《山海经》《列子》和《史记》等有其生命观的体现，认为天地和人体相互对应，生命运动和天地日月运动的节律相一致。生理学往往把能够完成诸如消化、新陈代谢、排泄、呼吸、运动、生长、发育和对外界刺激做出反应的功能的系统称为生命系统。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又往往把生命有机体看作是可传递编码在 DNA 和 RNA 中的遗传信息系统，这些信息可以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而蛋白质决定生物的主要性状。生态学的生命观把生命看作是生物圈中种种不可逆物质循环过程的中心环节。进化论往往把一个能够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系统看作是生命系统。

（二）水族文化研究

目前，热衷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不断地加大对水族文化的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潘朝霖、韦宗林主编的《中国水族文化研究》涵盖了水族社会诸多领域，包括水族历史、水族经济、水族政治、水书、水族文化艺术等，^①但没有专门的章节研究水族的生命观，更没有以水族从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为研究对象而去解释水族的生命观。水族文化研究的相关文献比较零散，水族本土研究者也比较少。20 世纪 40 年代，岑家梧、李方桂、张为纲、陈国钧等著名专家学者调查水族社会历史文化，发表出版了《水书与水家来源》《水话研究》《水家来源试探》等成果，成为水家学研究的奠基之力作。在水族社会里，大家比较公认的有，潘一志先生、潘朝霖先生、石国义先生等。年轻一代的学者有韦宗林教授、韩荣培教授和蒙爱军教授等。他们都对水族社会的研究作了相当大的贡献，为后人研究水族奠定了基础，但成果不多，尚需加大研究力度。

① 潘朝霖，韦宗林主编，中国水族文化研究，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3。

(三) 民间植物研究

康克林 (H. C. Conklin, 1926—) 率先进行了民间植物认知的研究, 于 1954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哈努诺人与植物界的关系》。哈努诺人的植物学资料因被列维 - 斯特劳斯 (Claude Lévi - Strauss) 在《野性的思维》一书中的引用而著名。在哈努诺人的语言中, “哈努诺人用 150 多个名称表示植物的各个部分和属性。这些名称为辨认植物和 ‘讨论区分各类植物, 而且还往往表明药用和营养的重要特征的几百种植物特性’ 提供了类目”。^① 可以说, 康克林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民间植物分类, 尤其是民间植物分类和命名的普遍原理的基础。1895 年, 美国植物学家哈什伯杰 (J. W. Harshberger) 在芝加哥太阳报上发表了关于 “土著植物学” (Aboriginal - botany) 的文章。次年, 他在《芝加哥植物学报》上正式采用了 “民族植物学” (Ethnobotany) 作为科学名词, 认为民族植物学是研究土著民族使用和进行贸易的植物状况的科学。1941 年, 美国民族植物学家琼斯 (V. H. Jones) 进一步研究, 认为民族植物学是透过文化现象来研究人与植物种群之间的直接相互作用的一门科学。1978 年, 美国植物学家福特 (Richard. I. Ford) 进一步发展这一概念, 确立了民族植物成为独立科学的地位, 并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②

新一代的民族科学研究者, 伯林与生物学家 P. H. 雷文 (Peter H. Raven) 和 D. E. 布里德洛弗 (Dennis E. Breedlove) 合作, 经长期对墨西哥南部和秘鲁的广大地区进行了田野调查, 尤其是对墨西哥讲玛雅语的泽尔沱人 (Tzeltal) 的植物分类进行了详细研究, 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 上先后发表了《民间分类学与生物分类》^③ 和《分类学的起源》两篇重要文章。他们将泽尔沱人的民间植物分类和生物科学分类进行比较, 划分民间植物分类与生物分类的三种关系: 粗分、细分和一一对应的关系, 探讨了民间分类群在文化上的重要性。美国人类学家 C. H. 布朗 (Cecil. H. Brown) 致力于民族科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发表论著有:《民间生物分类学中的独特先驱与隐蔽类群》《哈斯特克人的植物分类学》《生物和非生物民间分类的某些一般原理》

① [法] 列维 - 斯特劳斯, 李幼蒸译, 野性的思维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14.

② 裴盛基, 龙春林. 应用民族植物学.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1.

③ Berlin, B., D. E. Breedlove, and P. H. Raven: Folk taxonomy and Biological Classification [M]. Science, 154, 1966, 273 - 275.

和《民间植物的生活型：它们的普遍性与演进》等。他统计了世界上 105 种语言中的植物生活型术语后，提出民间植物生活型名称的演化过程，即人类对植物生活型的认知顺序。^① 其认知模式是先认知树，再到草，再到灌木和藤本。

在中国，裴盛基教授首先提倡“民族植物学”研究。1978 年 1 月 1 日，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民族植物学的机构——民族植物研究室在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成立。1990 年 10 月在昆明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民族生物学大会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obiology)，促进了中国“民族植物学”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② 2000 年，裴盛基先生荣幸当选为国际民族植物协会主席。不言而喻，我国民族植物学研究影响日益显著，赢得国际同行的尊重。^③ 中国民间植物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真正从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植物的比较少，需要加大研究力度。

(四) 认知人类学 (Cognitive Anthropology)

古德纳夫 (W. H. Goodenough) 是认知人类学的先驱者，他认为“所谓某个社会的文化，就是其成员明确认识的，相互关联的，为进行解释而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模式”^④，也就是说文化是某个社会的分类体系。由于深受“萨皮尔-霍夫假说”——文化模式塑着民族思维的假设的影响，并采用雅各布森的结构语言的方法，认知人类学试图探究每个民族的分类体系，因而早期认知人类学又被称为“民间分类学” (Folk Taxonomy)。从研究视角或研究者的立场来看，认知人类学借用派克 (K. L. Pike) 语言中的两个概念，即 etic (源于 Phonetic，语音) 和 emic (源于 Phonemic，音位)，来区分两种研究立场。简言之，etic (客位) 立场就是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来看待所有研究的文化；emic (主位) 立场是站在局内人的立场对待所研究的文化。因此，认知人类学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分析的方法。^⑤

① Brown, Ceil H. Folk botanical life-fo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growth [J].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77 (79): 318.

② 裴盛基, 龙春林. 应用民族植物学 [M]. 云南: 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 2.

③ 尹绍亭. 人类生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载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编. 中国民族学纵横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3: 123.

④ 庄锡昌, 孙志民. 文化人类学的理论构架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223.

⑤ 庄孔韶. 人类学通论 [M]. 山西: 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1: 26-27.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认知人类学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发生了转变。其重点不仅仅限于原住民对事物的分类及其关系的研究, 也注意对分类的心理过程的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 图式理论成了认知人类学理解文化心理方面的主要手段。认知人类学者越来越与结构主义者一样, 其最终的目的都是发现普遍的精神原则。认知主义者通过对文化的某个领域的词汇分析, 寻找某一人群的认知结构, 即存在于某一文化的成员心中的模式、规则或结构。认知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就是: 真正的文化存在于文化负荷者心中。^①

由于认知人类学所倡导的严格的研究方法, 因此象征人类学或解释人类学那种凭借人类学家的自觉而不能被证实的研究遭到了认知人类学的质疑。然而, 象征人类学却一直在从事认知研究。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认知对联系人类学的诗或象征方面的隐喻产生了兴趣。在隐喻和隐喻理论方面, 象征人类学和认知人类学产生了广泛的对话。^②

(五) 象征人类学 (Symbolic Anthropology)

人们将象征人类学追溯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对于代表社会地位和生命经历的各种仪式进行解释、赋予意义的研究。象征人类学有两种研究倾向: 一种是由列维 - 斯特劳所代表的, 以结构人类学、结构语言学、认知人类学为中心的“抽象的系统学派”, 重点放在神话研究中象征的分类和理论方面; 另一种以 V. 特纳 (Victor Turner) 为首, 是由微观社会学、社会语言学、民俗学、文艺批评等领域所共同具有的“象征和社会的动力学派”, 重视庆祝和祭祀及其具体过程。^③ E. 利奇 (Edmund Leach) 在《文化与交流》中, 用列维 - 斯特劳斯的烹饪三角式图解来表达蝴蝶结领带的意义—象征。^④ 特纳专门研究宗教与仪式。他发表了《象征的研究》《象征之林》和《恩登布人狩猎仪式的象征主义主题》等。他由于研究以治疗礼仪为中心的礼仪符号而体会到象征作用的力量, 因而把研究焦点置于动态的象征性上。^⑤

①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83-384.

② Jennifer Cash; Cognitive Anthropology, Http: //cognet.mit.edu/MITECS/Entry/casson.

③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84-385.

④ [英] E. 利奇, 郭凡等译. 文化与交流 [M]. 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90: 57.

⑤ 黄淑娉, 龚佩华.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 [M].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388.

王铭铭在其《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中指出,20世纪70~80年代,汉学人类学出现两大潮流:其一是社区调查的复归和范式的地方性检验的兴起,其二是象征人类学的发达。这两大潮流构成了汉学人类学第三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西方人类学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重视象征体系与社会体系关系的探讨。在一段相当长时间的和平时代出现之后,世界出现了新的格局,文化之间的交往方式也从战争转入经济文化霸权的争夺。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及其在世界文明格局中的地位问题重新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题,符号—象征体系作为文化独特的主要表现形式跃然成为人类学者的主要关注点。在道格拉斯(Douglas)、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特纳等著名学者的倡导下,象征人类学成为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在这一主流的推动下,许多从事汉学人类学研究工作的学者(如武雅士、芮马丁、王斯福等),十分重视“汉民间宗教”的探讨,他们力图在中国人的信仰、仪式与象征体系中发掘中国文明与社会构造的模式。^①

四、研究方法

本论文主要是以万物有灵论的哲理性为指导思想,根据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整体观、认知人类学和象征人类学等观点去加以解释水族从植物的认知到酿酒工艺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进而透视水族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与表达。在研究中具体采取如下方法。

首先,使用参与观察法。当前,人类学较为流行的研究方法是参与观察法,它要求人类学家从书斋中走出来,深入到土著居民的生活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与他们一起生活,收集第一手资料。本论文要直接了解水族怎么对120种酒曲植物的命名、分类和使用,这首先要求研究者了解水族的语言才有可能进行准确的记录。在田野调查期间,当地水族妇女热情帮助,妇女们带领笔者和其他调研工作者一起穿梭于深山老林和田间寻找植物标本。笔者共收集了120种水族酒曲植物标本和44种水族传统糯稻标本。借助汉语拼音,按水族语音记录它们的名称,以及记录这些植物的药用部位、分布和生产环境、采集、主要成分和作用、功效等。

① 王铭铭. 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17-18.

其次，使用深描的手法（Thick description）。在具体文本写作过程中使用深描的方法。水族酿酒工艺的整个流程及其对植物的认知非常复杂，但必须将每个环节都进行描写，不能漏掉任何细节。以便于解释其所象征的意义，更能准确地理解水族的生命观。为了确保民族志材料的科学价值，笔者在论文中将明确标明哪些是土著人的思考，哪些是笔者的理解。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唯有符合以下条件的民族志材料才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价值：我们可以分辨出哪些材料是由直接观察与土著人的陈述和解说得来的，哪些材料是作者基于他的常识与心理领悟得来的。”^①

最后，使用象征人类学的文化分析方法。由于象征文化构成的另一个语义世界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包括象征文化理解的文化认识将是不完整的，没有象征文化理解的文化解释往往是浅表性的，甚至是错误的。^② 借助象征研究方法，透视水族的生命观。

五、田野点概括

水族^③主要分布于云贵高原苗岭山脉以南的都柳江和龙江上游地区。水族由百越民族集团中的“骆越”逐渐发展成为单一民族。秦汉以前，水族先民主要活动于两广地区的邕江流域一带，秦伐岭南之后，逐渐向黔桂边境转移，并从百越民族母体中分离出来，至唐宋之际形成单一民族——水族。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水族人口约 41 万人，贵州境内的水族人口约 37 万人。主要聚居于三都、荔波、独山、都匀、丹寨、雷山、榕江、从江和毕节等地，其他水族人口分布在云南、广西等地。

水族自古以来都自称“睢”或“人睢”，即睢或睢人。水家民间有此古语：“吃水睢，成人睢；吃水河睢，成人睢”。古语指出了“睢水”“睢河”和“睢溪”养育水家人先民共同体“睢”“人睢”。“睢”“人睢”即为当今的水族。“睢水”“睢河”和“睢溪”在何方呢？中国以睢、濉命名的河道有

① [英] 马凌诺斯基，梁永佳，李绍明译，高丙中校。西太平洋的航海者 [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2。

② 居阔时，瞿明安。中国象征文化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4。

③ 潘朝霖，韦宗林主编。中国水族文化研究 [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2003；何积全。水族民俗探幽 [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石国义主编。水族村落家族文化 [M]。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07。